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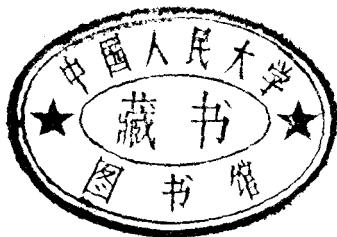
4252/11

1426415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 ——东西间桥梁

[美] 郝延平 著

李荣昌 沈祖焯 杜恂诚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武 曦

封面设计 邹越非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

〔美〕郝延平 著

李荣昌 沈祖炜 杜恂诚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15,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80515-034-6/K·10

书号 11299·031 定价 3.00元

序 言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上个世纪中国同西方的接触耐人寻味地改变了中国的方向，而接触的一种媒介就是买办。买办充当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桥梁。虽然这种人物现在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他们依然是争议的对象。买办常常被同胞谴责为卖国贼，因为他们最初侍奉的人不是孔孟之徒，后来他们辅佐的人又不是炎黄子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多重作用常常被人们轻视了。

本书论述围绕买办展开的社会经济制度，着手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比较受忽视的领域。本书探讨买办在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尤其是早期工业化)和文化思想转变等方面的作用。最后触及更广泛的有关文化移植的论题。本书主要以文献资料为基础，试图给复杂的买办问题作出较为清晰的透视，并对中西方关系问题从总体上予以说明。

这项研究原先是作为哈佛大学的学位论文进行的。我十分感谢费正清，没有他的指导和鼓励，这项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特别感谢刘广京，他的目录学知识和他的思想给了我很大帮助，他通过考察一些商业行号，对中国的条约口岸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对我的研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料想。我要感谢马若孟撰写的大量经济学和历史学著述，以及德怀特H·珀金斯对有关经济史问题的主要争论问题提出的有价值的见解。在撰写手稿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妻子杜宾汉(Pin-han)

给了我不可估量的帮助。

其他许多人也以各种方式给了我帮助。罗伯特·N·贝拉、沃尔多·H·哈利切斯、埃士拉·F·伏盖尔和杨联升都披阅了部分手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同托马斯·A·梅兹格就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般问题，同唐·C·普赖斯就润色文笔的问题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讨论都使我得到教益。我还要感谢在研究的各个阶段给了我帮助和鼓励的下列学者：罗纳德、陈延龄、勒鲁瓦·P·格拉夫、市古宙三、郭廷以、劳伦斯·F·西尔弗曼、尤金·吴和吴相湘。在作最后修订时，使我得益匪浅的，是弗吉尼尔·拉普兰特夫人和奥利夫·霍姆斯夫人编辑上的敏锐目光。此外艾琳·凯夫夫人和玛格丽特·福雷斯特尔夫人在我撰写手稿时给了我专业上的帮助；郑彦棻(Cheng Yen-fen)、李肖庭(Li Hsiao-ting)、梁嘉彬(Liang Chia-pin)和梁子衡(Liang Tzu-heng)为我安排访问几位从前的买办和他们的家属，在此深表感谢。

斯蒂芬·C·洛克伍德慷慨地允许我阅读他的有关琼记洋行的论文，在我利用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所藏各家美国洋行档案时，该馆的罗伯特·W·洛维特给了我帮助。承蒙伦敦孖地臣公司允许，使我得以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查阅怡和洋行档案。感谢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霍顿图书馆和贝克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埃塞克斯学会、胡佛图书馆、现代史学会图书馆和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东京东洋文库、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最高法院图书馆和剑桥大学的大学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其他各种帮助。

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美国哲学学会(彭罗斯基金会)和田纳西大学(学

院研究基金)的资助。我也感谢哈佛——燕京学会,1962—1963年我作为哈佛的研究生由盖伦·W·巴克斯特安排,得到了一笔出国奖学金。

郝延平

1969年9月于田纳西州诺克斯威尔

译者序

本书作者郝延平为美籍华裔学者，专攻中国经济史，现任美国田纳西大学林德赛·杨格历史学教授(Lindsay Young Professor of History)。本书原系作者在哈佛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1970年在美国正式出版，现列为《哈佛东亚丛书》第四十五种。除本书而外，作者参加了《剑桥中国史》的撰写，还著有《由守旧到革新》、《清流党研究：1875—1884年的‘非功利’士大夫集团》、《清末中国沿海的商业资本主义》等论文以及《十九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1986年出版)一书。

买办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人物。早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交往日渐频繁，买办就开始出现。到鸦片战争以后，外人大量来华经商，买办作为一种社会集团或作为一种经济制度都有一定的发展，其作用和职责也发生了变化。买办势力对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思想均有重大影响。买办问题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因此一直是很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的课题，也是观点分歧最大的课题之一。

本书是目前国外研究买办问题颇有影响的著作。作者为研究这一课题，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特别是国内罕见的十九世纪外国在华大洋行的档案资料，并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使本书具有内容广泛、材料丰富的特点。至于其观点，与国内学者则有不同。为有助于国内学术界更多地了解国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以供国内同仁参考。

本书的翻译，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丁日初研究员的大力推荐，他仔细阅读了本书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作者郝延平教授对本书翻译中的难点，给予了必要的指点。对于上述可贵帮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对书中所用的术语，尽力保持其原来的用语，书中提到的外国人，我们也尽可能译成当时所用的汉名。由于我们才疏学浅，力不从心，舛错难免，希望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5月

目 录

译者序	
序言	
第一章	导言：中国社会中的买办…………… (1)
第二章	西方商人及其中国买办…………… (15)
	西方商业行号…………… (15)
	对中国买办的依赖…………… (25)
	买办带来的其它利益…………… (42)
第三章	买办的兴衰…………… (51)
	买办的起源…………… (52)
	近代买办的兴起，1842—1900年…………… (56)
	买办在国外的散布…………… (65)
	衰退和没落，1900—1943年…………… (73)
第四章	买办在洋行中的职责…………… (76)
	洋行总管…………… (77)
	业务副手…………… (80)
	内地采购者…………… (89)
	总买办唐景星…………… (99)
第五章	买办：暴发户…………… (107)
	充当买办时的财富积累…………… (107)
	作为独立商人时的财富积累…………… (114)
	买办的总收入…………… (122)
第六章	买办和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131)
	外来的经济入侵…………… (131)
	近代中国的商业发展…………… (138)

	作为工业投资者的买办·····	(148)
	作为工业管理者的买办·····	(167)
	作为企业家的买办·····	(179)
第七章	买办制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187)
	充当买办的程序·····	(187)
	买办制度的作用过程·····	(197)
	买办制度的特征·····	(210)
第八章	不仅仅是买卖人：买办的非经济活动·····	(223)
	生活方式·····	(223)
	买办的社会政治活动·····	(229)
	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反应·····	(242)
第九章	结束语：东西方的中介人——买办的重要性	(258)
	参考文献·····	(275)
附 录	·····	(287)
	1. 琼记洋行买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	(287)
	2. 旗昌洋行买办（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到七十年代）·····	(288)
	3. 怡和洋行买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到二十世纪初十年）·····	(289)
	4. 宝顺洋行买办（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	(290)

插图：

1863年前任买办从汉口发给上海琼记洋行的市场报告。唐隆茂致 G·B·德臣函……	(44)
1866年日本横滨琼记洋行房屋平面图……	(72)
旗昌洋行在上海的房产，约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80)
1853年香港琼记洋行买办保存的付款收据	(82)
1866年香港琼记洋行买办支票……	(85)
1859年香港琼记洋行买办保单……	(190)
1860年香港琼记洋行买办保单，附意译的英文本……	(192)
1860年香港琼记洋行买办协议书……	(198)
1846年上海琼记洋行房屋平面图……	(198)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宝顺洋行买办徐钰亭穿戴官服的肖像(十六世德球公遗像)……	(230)
清政府表彰宝顺洋行买办徐润的牌坊……	(232)

表：

表 1 怡和洋行的各种活动……	(24)
表 2 1871年香港琼记洋行同买办往来现金帐……	(48)
表 3 广州对外贸易的衰落，1860—1865年……	(59)
表 4 各条约口岸关税征收数，1865—1867年……	(59)
表 5 1870年香港琼记洋行与买办往来现金帐……	(83)
表 6 汉口琼记洋行买办及其雇员的月薪	(109)

表 7	1842—1894年买办的总收入……………	(129)
表 8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兼 任钱庄主的著名买办……………	(143)
表 9	1866年上海至九江间外国船只承 运的主要商品中中外商人占有的数额	(147)
表10	1866年上海至镇江间外国船只承 运的中国土货中中外商人占有的数额	(148)
表11	上海旗昌洋行买办陈作坪对轮运业 的投资, 1862—1863年……………	(150)
表12	买办在华海轮船公司的投资, 上海, 1873年……………	(151)
表13	买办在中国的各家轮船公司的投 资, 上海, 1862—1875年……………	(153)
表14	买办在中国人拥有的轮船公司的投 资, 1872—1893年……………	(154)
表15	虞洽卿在轮运企业的投资, 上海, 1909—1918年……………	(155)
表16	买办在中国近代煤矿中的投资, 1863—1886年……………	(156)
表17	买办在中国近代矿业中的投资, 1863—1898年……………	(158)
表18	买办在中国棉纺织企业中的投资, 1890—1910年……………	(159)
表19	买办在中国机器制造业中的投资, 1883—1913年……………	(161)
表20	买办祝大椿的投资……………	(164)
表21	买办朱志尧的投资, 1897—1910年	(165)

表22	由买办创办和投资的中国第一批大型新式企业.....	(166)
表23	轮船招商局商董的社会背景, 1873年.....	(173)
表24	上海外商银行买办须缴纳的押柜, 1907年.....	(195)
表25	上海外资银行买办所雇用的职员数目, 1900年.....	(200)
表26	在上海的著名江苏苏州籍银行买办, 1870—1920年.....	(218)

第一章 导言：中国社会中的买办

人们一向认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逢”^①，然而，在晚清的条约口岸，以中国买办为中介，东方和西方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相逢了。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买办的中介角色不仅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的结局并非令人愉快。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在近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近代史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过程。西方冲击发生于条约口岸，并在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谈判和军事对抗通常是因贸易关系发生冲突而激起的，站在贸易背后的则是西方商人，贸易正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西方商人同一个本质上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接触，需要当地人的帮助。1842年废除垄断性的公行制度以后，买办取代了行商，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商业居间人。买办是在华外国行号的中国经理，在外国行号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

买办作为中外商人的居间人，首要条件是具有某种经济职能，这种经济职能乃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跳板。

① “哦，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逢，直至苍天和大地同时站在上帝的伟大法庭前。” 鲁亚得·基普林：《东方和西方之歌》，《鲁亚得·基普林选集》（The Works of Rudyard Kipling），纽约1909年版，第10卷，第11页。

由于1842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对商业中介人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了。然而，人们终于发觉语言上的困难和货币的复杂以及中国商业惯例、社会习俗不同，已是中外之间自由和直接交易的主要障碍。买办为洋行和中国商业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他们在洋行里，召募和管理中国雇员，充当银库保管，提供市场行情，为钱庄票据作保，从各方面协助外国大班同中国人做生意。

这种类型的商业中介人并不是一种独特的外来的制度，而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纯系中国的、人们称为牙行的特许经纪人制度早就在执行这类中介人的职能了。因此，即使外国人十分熟悉情况，比方说象河北的商人到广州那样，他们仍然会利用类似牙行那样的机构。事实上，1842年之前外商通过官方的中国牙行进行贸易并不少见。牙行是独立的抽取佣金的代理人，买办则主要是通过契约关系受雇于外商，在这个意义上买办不同于经纪人。然而新出现的买办是从公行制度中取得经验的，因为这种买办制度不是在真空中生长起来的，它有时取其他制度而代之，有时又兼容并蓄，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清代(1640—1912年)，中国人的商业活动广泛而又复杂，较有势力的商人是那些操纵茶、盐、丝、棉花和鸦片交易的人。他们中最值得注意的看来是垄断性的盐商^①，其次是行商。在早期中外贸易中，经营同欧洲人贸易的中国商人组成了商人行会——公行。公行是经官方特许的，并对官方负责，对所有同西方商人的贸易享有垄断权。公行的成员称为行商，在1842年以前，他们组成了最大的商业团体之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

^① 特别重要的是两淮地区及淮盐引区，其分布范围大致包括富饶的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见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京都1956年版。

国打败以后，《南京条约》导致了行商独霸对外贸易局面的结束。^①

当相当大的一批外国商人到达条约口岸时，这就为个人奋斗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新的买办阶级应运而生。不久以后，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加速了盐商的衰落。这样，外来因素同内在因素相结合，造成了一种更加有益于创办自由企业的环境。买办的兴起，虽然影响还没有大到足以把商业中心从内地全部移到条约口岸，但是它集中体现了这种趋势。条约口岸的兴起，这件事本身就为密不可分而又复杂的商业活动增添了一个新的巨大场所。

适宜的商业气候对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表明，有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的保护，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②然而，就清政府而论，它没有发挥对经济活动来说很重要的几种作用，如维持安定、制订商法、控制货币供应和制定度量衡制度。看来，缺乏安定和秩序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障碍。虽然十九世纪的中西方条约制度为帝国主义形形色色的入侵敞开了大门，包括享有治外法权、协定关税以及开辟外国租界，这个制度也在某些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它为商业追求创造了安定的环境。因为，由于得到外国人的保护，条约口岸的资财可免遭中国官员榨取，这样，商人也因此得以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中获得人身安全。虽然中国经济史的某些方面尚未为我们所知，但是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买办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免受官员的“勒索”或榨取，而靠经商积累起大量财富的第一批商人。

① 行商的历史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中1960年版。

② 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编：《变革与企业家：企业家史的原理和模式》，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49年版，第99页。

在十九世纪，经手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的买办，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积累了可观的资产。从每个人来看，他们的财富大概不能同以前的行商相比，但是他们的人数肯定超过了行商。同时，他们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经营现代贸易的方法，并有机会运用这种知识。因此，买办能够集资本的消极拥有者角色和积极经营者角色于一身，而使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富人。那些富人过着绅士生活，把资本的管理交给社会地位较低的管家去办。虽然传统模式也会有例外，可是买办显然组成了把财富和企业家的专长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富人。

中国传统商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显然不愿进入新的行业。这种倾向从“内行”与“外行”的区别中可以看到，它也许反映了对才干的传统看法。因此，当某人在某个特定行业立定了根基，就不肯转移到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中去，以免受累。

贸易方式一经改变，旧的行商很快地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这一事实可以说明传统商人不愿进入新的领域。后来，山西票商也不愿作必要的改变，结果在清末完全衰落了。甚至曾为左宗棠谈判筹借外债的著名钱庄主胡光墉对新的挑战也没有作出反应，没有接受李鸿章约他参加管理轮船招商局的邀请^①。轮船招商局最后由两个曾为买办的唐景星（1832—1892年）和徐润（1838—1911年）掌管。^②这种对变革的反感说明了为什么盐商很少参与新式企业的集资和经营活动，为什么传统的山西票商不能象日本的财阀那样能应变于经济形势。在这种背景下，是否可以把买办看作一种新型的实业家？他们是不是企业家？因

① 关于胡光墉的活动，见C·约翰·斯坦雷：《清末财政与改革者胡光墉》，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1年版，第1—44页。

② 刘广京：《两家在华轮船公司，1862—1877年》，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56年版，第99—192页。

此，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晚清时期中国特别缺乏企业家精神的断言也需作新的考察。^①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买办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的富有；而且在于他们能够把资本的所有权和企业的本领融为一体。更主要的是：买办作为最早同西方人进行直接而广泛接触的中国人之一，首先看到了近代工业的利益和前途。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其他阶层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认识。这倒不是买办对传统行业感到失望，而是他们知道现代企业是趋势。因此是他们首先进入轮运、采矿、纺织，最后是机器制造等近代行业，因而成为致力于中国工业化的前驱。

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买办还以另一种方式对中国早期工业化作出了贡献。有些纯属中国人投资、归中国人所有、按现代西方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也雇用买办。两个最引人注意的事例是轮船招商局和中国通商银行。同洋行的买办相反，中国企业的买办处理大部分同外国人有关的事务。这样，起初主要为适应外商需要而创造的制度，结果积极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企业。

买办在晚清历史中的复杂而重要的地位，引出了若干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买办的纯经济作用所牵涉的问题。买办有多少财产？他们的总收入有多少？他们怎样获得收入又怎样花费？他们为外国商人提供服务，是不是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上的急先锋？或者，凭借他们的经验，他们是否有能力在新式企业的经营上同外国人竞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阻止肆无忌惮的外国入侵？他们销售进口商品是帮助了外国人，还是他们向外国人出售土产有利于中国人？总之，关于外国经济侵略对整个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否主要应由他们负责？买办不仅

① 如 M·J·莱维、史国恒：《近代中国商人阶级的兴起：导论两篇》，纽约 1949 年版。